

談「蝴蝶春夢」

李昂

的電影與原著

「捕蝶人」(The Collector)是我少女時期相當喜愛的一本書，後來看了依此書改編的電影「蝴蝶春夢」，更十分著迷於男女主角的造形和演技，記得不管書或電影，都曾深深地感動我，但終歸是好幾年前的印象，只知道曾被感動，至於為何被感動，已說不出來。

近日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重播的「蝴蝶春夢」，有些詫異於影片中的一些觀點，找出「捕蝶人」要重讀，翻開書的扉頁，即有當年買書記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日期，算算已是十年前，不免想到匆匆竟過了這麼些日子，以及自身看法的改變。

十年前我剛上高一，正猛讀任何找得到的翻譯的存在主義作品，對這本書著迷可說十分自然，因為那時候我從這小說瞭解到的是：書中女主解萊蘭達代表要衝破社會一些束縛個人生命力與創造力的既成法規，勇敢的想要找尋一個真實的自我。這種存在主義式的自我追尋在小說中寄情於就讀藝術學校的萊蘭達，透過一段奇特的關係——病態的男主角囚禁萊蘭達為要她能愛上他，以及萊蘭達與年長她許多的畫家G·P·間一段似是而非的戀情，整個情

節可說已具備吸引住當時的我的先決條件，何況還含帶這麼重大的一個課題——自我追尋。

這時看的電影「蝴蝶春夢」深深感動我的也是男主角那種奇特陰悞的美，影片中他的孤獨、他與女主角間的不可溝通又是另一個存在主義的大課題。

十年後重看「蝴蝶春夢」，驚訝於這影片中傳達出來可能有的更深意義，找出「捕蝶人」重讀，發現小說與電影在觀點上的巨大差距，因而以為可以將兩者作一個比較，談一些問題。

就小說形式而言，「捕蝶人」相當自由，採取男主角自述與女主角日記並列書中，這兩種方式都是第一人稱自述，本可讓男女主角依自身看法，說出自己的觀點，但在「捕蝶人」一書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因作者主觀意識影響，採取了一個特定的角度來表現兩個來自不同環境、有不同際遇的人物，

男主角佛德烈在小說中是一個父親死於車禍、母親是流鶯的孤兒，由姑姑與姑丈養大，在稅務部作一個小公務員。從女主角茱蘭達的日記中，我們看到這樣的形容：

他六呎高……瘦長難看，手太大，難看而多肉的又白又紅。不是男子漢的手。喉結太大，手腕太粗，下巴太長，下唇凹進，鼻孔邊泛紅。腺狀腫，他的聲音陰陽怪氣，缺乏教養，却偏裝著有教養，反而使他越看越下等。

同時，在男主角第一人稱的自述裏，我們讀到他自認自己「偏裝著有教養」——他讀貴族化的高級報紙，去畫廊，並不為欣賞，只為不讓人以為他無知。並且作者在書中很明顯地暗示佛德烈的生理缺陷——性無能，以此有意無意地來解釋他的異常行為。

至於女主角茱蘭達，則是列級小鎮市紳的醫生女兒，雖然母親酗酒，但她漂亮、優雅、聰明，能得獎學金到倫敦上藝術學校。

於是在這個以男主角收集蝴蝶標本作多重象徵的小說裏，我們先看到美麗的茱蘭達為醜惡的佛德烈所囚禁，茱蘭達只不過是佛德烈的另一隻蝴蝶標本。另外我們看到作者有意以兩個主角人物來象徵在一個社會裏兩種不同的階層、心態。茱蘭達是「熱愛真誠、自由、慷慨，熱愛創造，熱愛行為，熱愛作個充實的人，熱愛每一件不袖手旁觀、不一味抄襲而內心枯竭的東西」，她是個藝術學校學生，有知識、感性、生命力、創造力，她關心氫彈試驗，她替孤兒募捐。而佛德烈則因沒有知識、缺乏教養，而至平庸、無趣、虛偽、自私、卑鄙、淫穢。而代表生命、美、崇高、自由的茱蘭達，一定會為愚昧僵死、固守既成法規的佛德烈所禁固。茱蘭達取得自由的代價很高，也許死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當然我們可以說，培養出茱蘭達的知識、教養與藝術所需的閒暇，是建築在無數佛德烈式的人在鎮公所、辦公室日以繼日地工作，而且茱蘭達所具有的她自認為美德的價值與她的藝術，也只不過來自她的中產者所屬的意識形態。可是我們立即發現，在這小說中，我們甚至不能以此來批判美麗的茱蘭達，因為小說作者很巧妙地將茱蘭達塑造成一個反叛的女英雄，如同她自己在日記裏所寫：「我無法忍受那些『已作』的事、『正當』的人們、和『高尚』的行為的令人窒息的氣氛」。茱蘭達因而具備了所有中產者的美德，諸如進取、富生命力、愛自由等，再加上她從事藝術，具有的自省能力足夠來批判中產者沉腐的一面，於是，我們面對一個幾近乎完美的人物。唯一能非難她的大概只有：來自中產階層的茱蘭達，一當她藉著中產階級培育她的藝術要向更高的階層攀爬時，她會較任何人都嚴厲地批判她出身的階層。

再來看佛德烈，在書中可說被作者藉佛洛伊德的理論分析，加上惡意的論斷。他的性異常顯然來自他與姑母及堂姊一起長大缺乏男性角色的緣故，他的性無能更是一個很好的宣判他缺乏能力的罪狀。除了這套佛洛伊德的推論，小說作者給我們關於佛德烈因他出身、教育導至的所有缺點：平庸、自私、鄙俗等等。

而在小說中，由作者在傳達他的看法將會有的極自然的掩飾，比如在小說人物的安排上，茱蘭達是引人同情的犧牲者，佛德烈則是殘酷的壓迫者，以及小說本身的說服力，我們在一種神入 (empathy) 狀況下很容易被作者的觀點取向所牽引，以致跟著走。可是當與電影相較時，我們很明顯地看出當中或會有的其他可能。

首先，導演威廉·惠勒選擇一個外表怪異的男明星泰倫·史敦普，在電影中呈現出的造型完全不像茱蘭達日記中所描寫的佛德烈：難看、淫穢、醜惡，而無寧只是一個個性怪異，在辦公室被嘲弄、欺壓的小職員。在電影開始用一場簡單的回述來介紹佛德烈贏得馬票的大筆彩頭時，導演安排一個稅務部的職員由樓梯上吊下來一件東西在佛德烈頭上旋轉，全體職員則惡意嘲弄地大笑，佛德烈只是不解，無依地任人取笑。由這個方向，當導演自小說中取材時，雖然選用同一情節，但在時間上作不同的安排，因而給予另種意義。最明顯的例子是影片將結束時，茱蘭達以斧頭襲擊佛德烈，佛德烈開車至市鎮找醫生就醫，三天後回家，茱蘭達已病重；最後一景，更顯示佛德烈心急要到市鎮替茱蘭達找醫生，甚至顧不得鎖上地窖的門，雖然在內心衝突下仍不會去找醫生，但回來後茱蘭達已死亡。而在小說中，茱蘭達用斧頭擊傷佛德烈，佛德烈並不會到醫生處就醫，僅自行包紮。之後茱蘭達生病得肺炎，由於佛德烈的一再拖延，並在茱蘭達生病時仍綁住她強拍裸體照片，一拖再拖的結果，使茱蘭達因得不到適當的照顧與醫生的醫療才死亡。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電影除了在人物塑造上不致太鄙薄佛德烈，更有意造成茱蘭達死因多少是個意外事件，如此使觀眾對佛德烈不至於一開始即存偏見與惡感。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導演美化了佛德烈，使得電影不忠於原著。電影該在何種程度內忠於原著的是非問題，不是我在此要討論的，但僅就「蝴蝶春夢」而言，我們却明顯地看到，因電影所取的觀點方向不同，致使電影有了小說沒有的「一種衝擊力（impact）」。

這衝擊力來自電影賦與佛德烈較合理的人性，不像小說一再強調他的平庸、自私、淫穢、卑鄙、粗俗，佛德烈因而只是一個普通的稅務部小公務員，只因發馬票的橫財，有錢得以實現他的幻想。而茱蘭達，由於電影中不曾依小說描寫的方式交代她的過去，她藝術學院的生涯、她與G·P·間的愛情只成爲一個美麗的藝術學校女學生。於是，基於兩個人物就善惡來說是較一致的基礎上，我們不致產生像讀小說對佛德烈會有的惡意批判，比較能客觀地來看討論的問題，瞭解到當佛德烈不懂一幅畢卡索的抽象畫，對茱蘭達說道：

「妳認為這是一幅好畫，只因爲妳的教授如此教妳。妳有沒有想過，在百萬正當（decent）人中，有幾個會認爲這是一幅好畫？」

我們會發現，這只是兩種對藝術不同的看法，一樣值得我們尊重和深思。而不致因取自小說中的觀點，認爲佛德烈及他所屬的階級平庸、俗氣、不懂「藝術」，否決掉佛德烈合理的問詢。當真只要我們仔細想想，究竟在百萬正當人中，有幾個會認爲一幅畢卡索的抽象畫是好畫？藝術的定義是不是只依少數階層的少數人所下的唯一一種，還是多數羣衆也有權力表示他們的意見？

如此在比較平等的取向上來看這兩個來自不同階層的主角，我們發現，導至兩人間的可溝通，不單只是兩個個人的問題，而是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背景所造成的差距。佛德烈深知在其所處的英國社會裏，跨越這個鴻溝的不可能，才想藉著將茱蘭達囚禁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希望少與外在世界接觸，她或會愛上他。當然我們發現，這種差距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克服的，同時，也不是茱蘭達以身相愛達到兩性間平等就可以解除的。也因當電影快結束時，佛德烈開車跟蹤下一個目標，是個女護士時，旁白說出他認為前次對象是茱蘭達是個錯誤，因為在她身上，他絕不會如願以償，而女護士是個可以教導的普通人，她會尊重他。我們深深體會到佛德烈如此做的悲哀。

惠勒常喜歡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比如早期的「嘉麗妹妹」，改編自德萊塞的小說。由於小說與電影表達方式不同，惠勒的電影常被批評為失去小說原有的特質。就「蝴蝶春夢」這部片子來說，這樣的批評當然是正確的，因為惠勒並不會採用小說的觀點塑造一對「特異」的角色，反倒將小說較狹隘的兩個特殊的人物平常化，不只將問題當一個特例處理，而發展到較大的容易引起共鳴的層次。惠勒的電影當然因而失去小說有的獨特的傳奇性，但我們只要看看傅勒斯(John Fowles)的「捕蝶人」在英國文壇上並無太高評價，就可以明白，當一個作者因其認識的緣故，觀點取向上先有所偏差，對本來俱能有說服力的兩方面，偏向其中一方，不僅導至失去兩方勢均力敵可以產生的豐富的衝突效果，也限制了作品本身的發展性。反倒是像惠勒，他在處理上並不像傅勒斯特別鄙薄佛德烈，僅將問題以較合理的方式呈現出來，不但帶出問題更廣泛的意義，使作品有更高的價值，也給讀者一個更深入思索及企圖解決此問題的機會。